

传承与焕新: 红色体育文化的范畴锚定、发展嬗变、困境及其纾解

于思远¹, 顾帅², 毕金泽¹, 郭振¹, 刘波¹

(1. 清华大学 体育部, 北京 100084; 2. 华东师范大学 体育与健康学院, 上海 200241)

【摘要】: 红色体育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传承红色体育文化体现了文化强国与体育强国协同发展的理论自觉。研究指出红色体育文化的研究范畴应超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区间而涵盖党的整个发展历程, 在此基础上提出红色体育文化的概念: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华民族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体育事业展开革命性、群众性、科学性、教育性等方面改造, 并在国家建设、改革与发展中不断创造性转化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体育文化, 引领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发展方向的一种红色文化。进一步指出当代红色体育文化的4大传承困境: 红色体育文化传承主题的历史场景较为滞后; 红色体育文化传承规划的政策内容尚不完善; 红色体育文化传承方式的青年面向不够明确; 红色体育文化传承愿景的全球关切存在局限。最后提出纾解之径: 第一, 焕新传承话语: 构建基于历史且关切当下的红色体育文化符号体系; 第二, 完善传承政策: 针对性设计红色体育文化的政策内容; 第三, 创新传承方式: 以新时代青年为核心对象打造全方位的红色体育文化实践活动; 第四, 开拓传承愿景: 探索并搭建起红色体育文化与全球体育文化互动交融的多维路径。

【关键词】: 红色体育文化; 新民主主义革命; 新时代; 文化传承; 文化焕新

【中图分类号】: G8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5656(2023)05-0020-10

DOI: 10.15877/j.cnki.nsic.20231106.001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1]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红色体育在党领导中华民族探索体育发展道路、革命事业乃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烙印。红色体育文化作为红色体育实践中物质与精神财富的高度抽绎, 与社会主义体育文化一道成为中华体育文化的核心内容, 其中所凝练的红色体育精神包括苏区体育精神、长征体育精神、延安体育精神^[2]与后来的女排精神、北京冬奥精神等, 共同构成了中华体育精神的质料, 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文化强国的重要历史资源。

在2023年6月召开的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 习近平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上统筹部署新时代新征程的文化发展任务, 强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3]。习近平文化思想也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会议上被正式提出, 标志着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步伐行稳致远。因此, 体育事业需要充分借助国家大力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略, 传承、发展好中国精神^[4]。其中, 红色体育文化作为体育强国建设的基石性文化, 应当与时俱进得到保护与传承, 搭建起体育强国与文化强国的协同发展之津梁。基于此, 研究站在启航新时代新征程的重要历史节点, 锚定红色体育文化的研究范畴, 并对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传承样态展开时代审思, 进而剖析红色体育文化传承发展的困境及其纾解路径。

收稿日期: 2023-08-3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ATY009);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3批面上项目(2023M731994); 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专项课题(2022-11-23-LXHT010)。

第一作者: 于思远(1993—), 男, 黑龙江牡丹江人, 博士, 博士后, 研究方向: 体育政治, 体育学原理。

通信作者: 郭振(1981—), 男, 江苏徐州人, 博士, 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竞技体育, 体育社会学, 体育环境。

1 红色体育文化的范畴锚定

考察当前红色体育文化的传承现状,发现其作为红色体育与红色文化的交叉域,却呈现出了在二者研究范畴的割裂现象。对当前学界研究动态进行具体分析后发现,红色体育文化的研究视域植根于红色体育实践。根据党挺等^[5]对60年来我国红色体育研究的评析判断,红色体育是“‘五四’运动开始至新中国成立(1919—1949年)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劳苦大众为主体的、新式的人民大众体育活动,统称为红色体育”。从中可见,红色体育的历史跨度主要涵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就是说红色体育在新中国成立后便完成了其阶段性历史使命,执此观点的还有王增明^[6]、刘显^[7]、杨芳^[8]、毕金泽^[9]等一众学者。然而,红色文化的研究动态却涵盖了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的百余年,其中的权威观点认为“红色文化从广义上说,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创造的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先进文化”^[10]。可以发现,红色文化理论界认为红色文化是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先进文化,其生发动力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旨归对文化活动展开的持续深耕。经过对二者研究范畴的比较,暴露出了当前红色体育文化研究掣肘于红色体育研究在历史区间上的局限,使得其作为一种文化研究未能与红色文化研究形成共轨,进而限制了其在新时代新征程文化传承中的纵深化。

根据这一判断,研究对红色体育文化进行范畴锚定。认为就活动史而言,红色体育所秉持的主流研究范畴是符合历史呈现的,只是对红色体育文化的研究延展,需要超脱路径依赖而进入红色文化研究的历史观。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红色体育文化作为红色体育实践升华物的精神火炬作用,并衔接起红色体育与红色文化研究的交叉域。基于此,本文立足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在对红色体育与红色文化的逻辑关系进行考察后,采用“属+种差”的规范定义方法对红色体育文化作出定义: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华民族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体育事业展开革命性、群众性、科学性、教育性等方面改造,并在国家建设、改革与发展中不断创造性转化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体育文化,引领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发展方向的一种红色文

化。该概念将红色文化作为红色体育文化的上位属,与红色艺术文化、红色教育文化、红色军事文化等并列。红色体育文化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体育文化提供了历史基础,并在后者的不断延伸下实现了自身的再发展。进一步考察红色体育文化、红色体育精神与中华体育精神之间的关系,认为红色体育文化是红色体育精神的思想来源,而红色体育精神则是中华体育精神的重要组成。正如党挺^[2]所总结的:红色体育精神是革命精神在体育事业中的集中体现,它与中华体育精神一脉相承,是中华体育精神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特殊表现形式。

2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新中国发展:红色体育文化的发展嬗变

前述分析指出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红色体育文化更多被置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区间中,然而其并未在新中国之后消失,而是浸润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事业建设的方方面面。因此,有必要对红色体育文化在时代更迭过程中的样态与变迁进行把握,以更加系统地呈现当前红色体育文化的种种特征,并为后文解析当前红色体育文化存在的现实困境做出铺垫。

2.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色体育文化主要特征

2.1.1 革命斗争性

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特殊时代背景相适应,红色体育文化蜕生于革命战争年代,势必服务于革命斗争,维护红色政权建立的外部环境。毛泽东在《二苏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赤色体育运动与青年》亦指出:“一切运动或体育组织,在政治上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中立的……在苏维埃区域里,我们工农劳苦青年群众,为能在体格上适应阶级斗争的需要,需要有一种集团的精神,健康的身体。”^[11]具体而言,红色体育文化的革命斗争特征体现在红色体育运动的军事化,包括武装竞走、爬云梯、射击等军事运动项目以及各类军队体育比赛。除此之外,当时的军队在保持战斗力方面也强调通过体育运动来提高革命军人的身体素质、增强战斗能力。

2.1.2 人民主体性

人民主体性是红色体育区别于其他体育类型的核心特征,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载体”的革命初心。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广大的劳苦青年群众是中央苏区红色体育的主体。以人为本,以广大工农群众的身心健康为根本。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12]主要体现在对当时国民党统治下仅有地主资产阶级享有体育权的批判与改造,《青年实话》撰文针砭时弊:“在那里,青年工农群众是被剥夺了真正的体育训练的一切可能和权利。”^[13]由此,红色体育打破体育在社会制度中的不平等,将体育权复归大众,正如《红色中华》的报道:“这里的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其子女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14]从此,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以人民群众为核心,捍卫其参与体育的各项权利,结束了剥削阶级垄断的体育历史。

2.1.3 教育性

教育性是党建设红色体育文化的重点着力方向。在体制机制构建之初,体育归属于教育系统进行管理。在苏区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设置的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是红色体育工作的一级管理机构,下设少共苏区中央局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赤色体育委员会分别作为二、三级管理机构。亦如毛泽东所强调的:“必须无情地与忽视教育以及教育工作中一切不正确的观点与倾向作斗争,才能真正为着战争的需要,一刻也不容缓地发展苏区的文化教育建设。”^[15]当时的中央教育人民委员会训令亦指出:“文化教育应成为战争动员的一个不可少的力量。”^[16]随着“体育为人民服务”“运动要经常”“发展赤色体育运动,养成集团精神与健强体格”等口号的提出,《体育节(九月九日)举行办法要点》《各种赤色体育规则》《延安体育会建议各机关学校加强体育》^[17]等政策文件的制定与深入人心,红色体育成为中国共产党展开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的重要载体。

2.1.4 务实发展性

囿于客观条件,红色体育实践在起步期面临着物质条件的重重困难。但是中国共产党基于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精神引领,红色体育形成了因地制宜

的实践原则,并进一步发展为红色体育文化的务实发展性。人民群众在山地、草原环境中,在军事斗争的过程中利用有限的条件,发展出了角力、举石、爬木城、抓特务、打胡壑等习武性游戏^[18]。在苏区时期,群众自制了“土篮球”“土足球”等^[19],在延安时期,群众自制了简易的篮球架、跳马、单杠、冰鞋等体育用品^[20]。由此,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发挥着主体能动性,群众体育、军事体育、学校体育等在有限的客观条件下,仍然保持着高涨的体育热情与创造力,以红色体育文化融汇了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现代体育文化,探索出了与当时时代背景相适应的体育实践方式。

2.1.5 “国内革命与国际理想”兼顾性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仅基于近现代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成了高度互动与共鸣。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兼顾国内民族振兴与国际共产革命理想。该思想浸润到红色体育中便塑造了“国内革命与国际理想”兼顾性特征。“五卅”运动会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赤色体育委员会代表着千百万中国群众一致通过加入赤色体育国际(列宁所创立红色国际中的体育组织)。1934年“九二”国际青年节,中华赤色体育会特号召中央一级机关的青年组织体育比赛响应共产国际^[21]。在1936举行的“五一”运动大会召开之时,朱德更是作出指示:“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是全世界劳动人民团结战斗的纪念日。在这样一个日子里,在长征的路上,我们举行这次运动会,很有意义。”^[2]从中可见,红色体育文化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不仅关切中华民族发展,更高举世界发展大旗,这说明红色体育在建立之初便内嵌着对人类共同命运的远大理想,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铺垫。

2.2 红色体育文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嬗变

文化作为特定共同体在能动改造世界过程中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构成了共同体的共有记忆与认同基础。虽然既往关于红色体育研究的主要视角置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但是研究认为红色体育文化作为红色体育实践的升华,在新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过程中并未消解,而是内嵌、浸润到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方方面面。正如谷世权所指出的:“红色体育继承了‘五四运动’以来

一些先进体育思想与实践的光荣传统,紧密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有力地配合了各个时期的革命斗争,并且成为全国解放后社会主义体育的先声,为之积累了经验、准备了干部。”^[22]经过70余年的沉淀,中国体育事业正稳步迈向体育强国。研究围绕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体育实践对红色体育文化的发展嬗变做出5大特征研判。

2.2.1 “革命斗争”向“奋斗复兴”的时代转变

服务革命斗争是红色体育诞生的初衷之一,然而随着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党的重心由革命斗争转向国家发展,红色体育也由此需要重新确定发展方向。革命化、军事化、斗争化作为红色体育强烈的文化烙印,致使其未能成为新中国后绝对主导的体育文化,转而由社会主义体育文化对其进行包裹与携进。自此,红色体育文化的革命斗争特征转向奋斗复兴特征,作为社会主义体育文化与红色文化的交叉域持续发光发热。正如毛泽东认为红色文化是“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23],红色体育文化则是中国人民秉持马克思主义原理对现代体育文化与中华传统体育文化进行能动改造的新体育文化。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体育工作的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与他在1941年为《解放日报》体育专刊的题词“开展体育运动,提高人民体质”一脉相承,形成了历史呼应。要而言之,不论是革命斗争还是奋斗复兴,都是直接围绕着中华民族从救亡图存到现代化发展的核心任务展开,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一样的主要矛盾。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将体育与社会进步和中国革命的阶段任务深入结合,作为一种长期性的事业进行发展,而不是工具性的对待。

2.2.2 “人民主体性”的着力深耕

人民是党的生命之根、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不管在中国共产党的任何历史阶段,人民始终是社会主义实践的最终目的。由此,在红色体育被纳入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过程中,坚持人民主体性构成了思想支柱。1949年10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成立之时,名誉主席朱德便在会上将“体育事业一定要为人民服务”^[24]明确为社会主义体育的统领性思想。在70余年的历史中,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始终延续着红色体育对于集团的精神强调。与此同时,

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阶段的体育事业延续着红色体育对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从1990年北京亚运会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再到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顺利举办,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迈进。在人民的共同参与下,体育已然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

2.2.3 “教育性”在目标与内容上与时俱进

红色体育文化内蕴着深刻的中国共产党教育思想。步入新中国后,随着客观形势的转变,党关于人民的教育目标与内容亦与时俱进发生变化。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召开的“全国体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冯文彬在题为《新民主主义的国民体育》的报告中“提倡集体主义的精神,在共同目标下,发挥各个人的高度积极性和创造性”^[25]。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转化红色体育文化的教育目的与内容,将其文化核心由“革命”向“发展”进行了着力设计。随着新中国的发展,红色体育文化的教育性为体育课程思政的落实提供了精神支撑,如为国争光的责任意识厚植着青年的家国情怀、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积聚着青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顽强拼搏的实践态度孕育着青年追求卓越的意志品质、务实发展的坚定心态传承着青年实事求是的踏实作风等。

2.2.4 “务实发展”在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建设中的有效引导

红色体育文化中关于务实发展的诸多实践经验与历史资源充分迁移至社会主义体育事业中,并形成了长远的历史回响。例如,无线电测向、手雷投掷等具有军事色彩的红色体育运动项目在新中国成立后保持着活力。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体育事业百废待兴时,党领导人民基于有限的客观条件发展体育运动,并通过聘请苏联体育专家援助的方式得到了迅速发展。体育系统的各级领导秉持红色体育文化,不仅身体力行参加体育运动,还基于改造旧体育、建设新体育的背景下对原国统区体育人员进行了改造与吸收,吸引了马约翰、吴蕴瑞、徐英超等知名体育人士投入工作。其中,党中央对时任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的积极态度,为我国体育事业在国际舞台上的实践铺平了道路。在红色体育文化的务实发展特征迁移下,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事业如火如荼地发展,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体育发展

道路^[26]。

2.2.5 “国内国际兼顾性”特征在“伟大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的内涵丰富

红色体育文化兼顾国内革命斗争与国际共产主义理想,这一特征随着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体育文化的发展与融合,其内涵获得了丰富。表现为兼顾国内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在国际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过程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两个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理论”,再到“和平发展观”“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全球分享,党中央以体育对外交往、竞技体育、体育教育等形式推进了相关战略部署。同时,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复兴理论与实践的不断丰富,搭建起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学理关联,其中体育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发挥着贯通国内外两个大局的重要杠杆作用。红色体育文化关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兼顾性特征也由此成为社会主义文化保持活力的重要历史溯源。

综上所述,红色体育文化作为红色文化的一部分,其缘起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留存于党和新中国的成长史,并转译为社会主义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影响着当代的体育实践。正如李强^[27]所指出的,红色文化与革命文化的关系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他们都属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部分。红色体育文化中的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人民中心、艰苦奋斗等宝贵特征超越了时空限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方法,与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现代体育文化相结合,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体育道路的文化奇观。

3 红色体育文化的当代传承困境

习近平多次强调,红色传统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让红色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红色体育文化和其孕育的一系列体育精神是新时代中国体育发展的旗帜,是新时代体育文化的价值核心和精神主体。对此,研究基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般规律进行系统考察,即“传者→红色文化→载体→传承者→红色文化→载体→承者的模式反复运行、螺旋展开”^[28]。根据该模式,有效的红色体育文化传承过程应当是各个环

节顺畅推进,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内部滞塞或者外部破坏都会造成传承困境。基于该视角,研究发现红色体育文化的传承与焕新主要表现为4方面传承困境。

3.1 红色体育文化传承主题的历史场景较为滞后

该问题表现为红色体育文化传承核心主题仍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革命斗争背景呈现出强关联,未能形成当代话语主题的有效场景转换。固然红色体育文化不可脱离于当时的历史背景,革命斗争的时代诉求造就了红色体育实践,但仅通过简单的复现历史场景以唤起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则会形成一种历史与现实的疏离感,随着代际更迭造成历史记忆的自然消解。随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事业与文化事业围绕着经济发展而不断书写新的辉煌,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实现奥运奖牌“零的突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顺利举办再到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完美落幕,垒筑起了新的象征性文化。而红色体育文化在其中的文化再造与蛻生却较为有限,即未能将话语主题有意识地根植入当代场景。尤其中华民族的年轻一代沐浴在快速发展的经济红利中而对近代中国的苦难历程缺少共情,无法感同身受地理解并体会红色体育文化。同时,受到以欧洲足球、美国篮球为代表的西方体育文化的影响,外部体育文化猛烈冲击着植根于特殊年代的红色体育文化,造成其舞台不断受到挤压而陷入边缘化。这对于作为社会主义体育文化根基的红色体育文化而言是迫在眉睫的传承问题。正如杨海霞^[29]所指出的:“红色文化处于文化教育、物质符号现实存在,但其文化观念、意义未能完全内化于民众内心的矛盾状态。”这一矛盾在红色体育文化中同样存在,值得警示与深思。

3.2 红色体育文化传承规划的政策内容尚不完善

红色体育文化的传承发展不可脱离于党对于其时代价值的认识与功能的定位,政策则是具体的纲领性表达。关于红色体育文化的政策是其明确自身发展规划并获取发展资源的政治动力。考察新时代以来的统领性红色体育文化政策文件,发现其内容总量鲜少,针对性亦较为有限,未能在政策文件中得到凸显。在《“十三五”体育发展规划》与《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中,未出现一处针对红色体育文化的政策制定,而是将之作为子部分纳入体育文化的发

展建设中。在《“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中,仅出现了两处关于红色体育文化的政策表述,分别是“33.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中的“赓续红色血脉”与“36.加强体育文化创作及平台建设”中的“红色体育博物馆”。

由此可见,红色体育文化在政策文件中处于一定程度的缺场状态,实际上,赓续红色体育文化正是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体育文化的重要历史根基与实践抓手。进一步而言,红色体育所蕴藏的深厚文化资源没有通过政策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转换,表明了其在战略高度与大众认识尚未实现从特定历史时代向当代发展的文化联结。从另外一层意义上而言,体育管理者可能认为红色体育文化属于强政治弱体育的文化种类,因而在潜意识中将之归属为红色文化的管辖范围而未充分研判其中深刻的体育文化价值。对于政策缺场的传承困境,需要得到针对性破除。

3.3 红色体育文化传承方式的青年面向不够明确

红色体育文化传承是一种扎根历史记忆并着眼未来的实践活动,是不断吸收新鲜血液,构筑共有记忆的过程。考察红色体育既往的传承方式,发现其主要仰赖主题教育、物质遗产参观、红色体育文化节、红色体育运动会等形式,未能与当代青年展开深入对话并形成情感联结。对此,需要意识到新时代青年在红色体育文化传承的特殊地位,因为青年意味着活力与未来,是文化传承发展的核心对象,正如中华文化学院的研判:“看一个文化是不是活着的,就要看它的基本精神是否还能打动现实的人群,与实际生活和历史进程有呼应。”^[30]红色体育文化起源于苦难辉煌的革命战争年代,对于老一辈人来说是深刻且不可磨灭的历史。但随着亲历者的逐渐退场,前人珍贵的历史遗产对于后人来说渐行渐远,需要有感染力的场景复刻来产生情感共情,红色体育文化才能够得到有效传承。因此,现有的红色体育文化传承路径对于当代青年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对其内涵的诠释性教育还不够深入,当代青年更多停留在对红色体育故事进行基本了解,对英雄人物、重大事件的感人事迹产生即时感动的表层,而未有效将其融入日常生活。而当代青年身边氤氲着各式各样的体育文化,对历史记忆的探求意识相对淡薄,在很大程度上挤压了红色体育文化历史记忆的留存空

间。在各种娱乐导向的体育文化压迫下,青年无法投入太多时间与精力去主动缅怀红色体育历史,这就导致了红色体育文化在其眼中是一种有距离感的象征性符号,陷入漂泊的心灵体验。因此,红色体育文化亟需搭建起与青年情感共情的新传承路径。

3.4 红色体育文化传承愿景的全球关切存在局限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文化承载着一个民族对世界的理解形式与实践方式。体育作为“最全球化”的文化形式,具有关切人类命运的高尚理想,而一个民族的体育文化只有在平衡自我与世界共同发展的前提下才更具发展活力。因此,红色体育文化应当充分挖掘自身兼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特征,成为我国体育走向世界的重要软实力资源。

当前,红色体育文化的传承愿景未能与全球体育文化形成互动,而仅在我国特定的人群中展开实践限制了其文化活力,“区域茧房”效应降低了红色体育文化的世界意义。而我国在逐渐迈向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中,更需要文化、价值观等软实力的积淀^[31],对文化自信的强调一方面基于国内的自我认同,另一方面则致力于国际的深远影响。目前,红色体育文化尚未建立起全球发展意识,体现在红色体育文化实践没有走出国门、红色体育文化的专著与论文均在国内、红色体育遗产没有与世界体育遗产融合开发等方面。这就造成了我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对于红色体育文化的认知十分有限,惯性地从政治话语维度将红色体育文化归置于意识形态管理,造成刻板印象的加深与误读。然而,红色体育文化内嵌着中国共产党、中国体育关于世界体育发展的宏大愿景,其中的国际关切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根同源,对于我国参与全球体育治理、推进全球体育向善发展大有裨益。文化作为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红色体育文化需要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我国参与度较高的国际公共产品或多边平台,致力于让他者了解红色体育文化内核。进而与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社会主义体育文化、中华体育精神一道,通过“一带一路”“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国际多边平台向世界传播与分享红色体育文化,不断夯实我国国家软实力的文化内容。

4 红色体育文化传承发展的纾解之径

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了最新指示:“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32]中国体育事业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红色基因与底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事业发展的本位坐标。因此,研究围绕前述4大困境,针对性地设计红色体育文化传承发展的纾解之径,使之在体育强国、文化强国的建设过程中实现自身的创新性发展。

4.1 焕新传承话语:构建基于历史且关切当下的红色体育文化符号体系

文化传承需要以具有感染力的符号作为基本载体^[33],红色体育文化符号体系是对其文化内蕴具体内容的切实表达,能够对其中具有高深影响力事物进行抽绎后形成的象征性形式系统。通过将红色体育文化中的历史资源与当代话语主题进行联结,创造性地构建红色体育文化符号体系能够较为突出地丰富其活力,使之自然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对此,可以将之分为3个维度。

其一,红色体育物质文化符号。红色体育具有大量的外物质性遗产,包括遗址、奖杯、器材、历史文件等,这些物质载体简单、直观,能够直接与人们产生视觉与触觉上的关联。对此,应当重视充分激发民间的想象力,设置一系列的红色体育文化项目,将之打造成知名品牌。例如,依托红色体育博物馆与各地方体育局、教育局,开展红色体育历史进校园活动,让青少年亲身触碰到这些历史。在红色体育旅游中加入红色体育竞赛项目,为参与者创造当时的历史场景,在其亲身体验中,了解过去,产生历史记忆的传承。

其二,红色体育制度文化符号。制度文化符号主要体现为党在展开红色体育实践所积累的相关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等内容,直接决定着红色体育文化的内核。对此,应当发挥政府部门的领导作用,将红色体育文化纳入体育事业发展的各个方面中,并创造标志性符号。例如,推动红色体育博物馆的全国巡展活动,在“五四青年节”“七一建党节”“十一国庆节”等重大节庆日和纪念日,开办红色体育运动会。同时,开展红色体育运动会进“一

带一路”、进“上合组织”、进“金砖国家”等活动。基于文化的民族性,在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责任担当中,形成讲述中国故事的现代化^[34]。

其三,红色体育精神文化符号。精神文化符号则是红色体育文化的高度抽绎,应当主动将红色体育精神中的延安体育精神、苏区体育精神、长征体育精神等纳入中华体育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之中,更好地弘扬中国体育百年建设的艰辛探索。对此,一方面,应当由学者牵头对红色体育的系列精神进行历史诠释与总结,凝练出便于理解与传播的系列体育口号^[35];另一方面,由政府设置专门的红色体育文化组织管理机构,在全国各地统筹红色体育文化资源,并由专员进行资源的整合与再造。除此之外,还应借助各类新兴媒体搭建新时代红色体育文化传播平台,打造官方媒体展开推广与宣传。久而久之红色体育文化的精神符号便能够得到充分沉淀。要而言之,三大红色体育文化符号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具象到抽象,能够构成较为完整的符号体系。

4.2 完善传承政策:针对性设计红色体育文化的政策内容

政策是指“国家机关或执政党制定的旨在某一问题的权威性行动准则”^[36],代表着官方对某一事物的发展态度与引领方向。红色体育文化则亟须在政策文件中得到更高阶的系统思考与内容丰富,以此发挥我国政治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由上至下地在全社会范围内提高对红色体育文化建设的重视。具体包括以下3方面措施。

其一,基于国务院办公厅领导,以国家体育总局为龙头,结合教育部、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门,组织红色体育文化发展建设专项研讨会。红色体育文化政策制定首先需要上层部门进行系统研判,在各部门之间搭建起信息互通渠道与资源共享机制,明确红色体育文化当前发展的痛点、难点、堵点。进而由各部门集思广益提出发展思路并制定发展方案,并将之纳入各部门的阶段性政策文件制定中,以此保证红色体育文化政策的稳步完善。

其二,在政策文件中设置“红色体育文化开发与创新专项工程”。专项工程是我国政策文件中较为特殊的一类,体现了相关部门在一定时期对某项工作的专项部署,如《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中设置了

9大重大工程专栏。基于该思路,红色体育文化也可在政策文件中单独成立工程专栏,结合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体育强国的发展要求明确其建设方向的四梁八柱及其关注点,以此突出其发展的优先位置。在此基础上对建设效果进行评估反馈,针对具体发展问题进行政策的再设计与优化,不断推进红色体育文化的传承创新。

其三,打造红色体育文化专门性研究智库。在大兴调查研究的总体要求下,红色体育文化发展需要来自学界的探索引领,打造红色体育文化的专门性研究智库。可以在红色体育实践的革命老区结合当地科研水平较高的院校,依托当地独有的红色体育历史资料及各红色体育科研团队的前沿认识设置相关智库,如曾飙教授所在的赣南地区、党挺教授所在的陕西地区、崔乐泉教授所在的山东地区等,将相关智库成果以决策咨询报告的方式进行呈交,为红色体育文化的传承发展不断注入生机活力。

4.3 创新传承方式:以新时代青年为核心对象打造全方位的红色体育文化实践活动

红色体育文化传承的核心对象是青年,只有将红色体育文化的历史记忆植入青年人的心中,才能够永葆文化的青春活力。观察以奥林匹克文化为代表的世界体育文化,出现了鲜明的青年转向,街舞、轮滑项目接连入奥,电子竞技项目进入亚运会,均标志着奥林匹克运动自身原有的文化基因对青年人的吸引力在下降,需要通过一系列措施积极向青年靠拢。对此,红色体育文化也应当革除自身的部分历史窠臼,主动向青年进行靠拢,找到其政治教育与体育价值的平衡点,融入青年人的生活。

其一,以红色体育社团、剧团、运动会等方式打造校园红色体育文化。在青年人的直观感受中,与红色体育始终存在着历史距离。对此应当吸收汉服、武术、戏剧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路径,将红色体育中的服饰、竞赛项目、影视剧等元素生活化、艺术化,吸引青年人的目光与兴趣。在积累一定的青年受众后由其自发地成立相关社团、组织运动会、打造广播节目、进入宣传橱窗与校报等,在参与中不断推陈出新红色体育文化。在这一过程中,红色体育中的吃苦耐劳、因地制宜、顽强奋斗等精神便自然而然地为青年人所理解。

其二,创新红色体育传播形式,使其从器物到精

神,全面融入青年人的生活方式。既往红色体育文化传播的方式主要以党组织学习、红色旅游、器物展览等方式展开,其教育效果难以充分调动青年人的主观能动性。对此,可以针对当前青年的生活关注点对红色体育文化进行改造,如将之纳入相关的综艺节目中、由红色体育亲历者讲述系列故事、红色体育进入影视作品等。除此之外,还可以打造红色体育线上媒体平台,让青年人能够直接获取红色体育资源并对其进行再设计,融入当前的各类主流体育文化中。

其三,发挥新时代青年的主体能动性与创造力,探索并打造红色体育文化产业。在信息化的时代中,文化若想迅速发展必须与媒介进行深度融合,因此打造红色体育文化产业是吸引青年人的不二路径。具体可以由专业团队以红色体育为背景或主题打造影视剧、舞台剧、动漫、音乐会等,深入开发历史资源建设红色体育特色小镇等。在公司团建、党组织党建的过程中提供红色体育相关文化服务,由此实现红色体育由历史资源向当代产业的转化。长此以往,青年人便能够由被动感受向主动参与转变。

4.4 开拓传承愿景:探索并搭建起红色体育文化与全球体育文化互动交融的多维路径

红色体育文化中的国际关切始终未受到学政界的深入思考与开发,而该方面是传承红色体育文化的重要突破口。文化只有在碰撞中才能实现交融并协同发展,因此,红色体育文化如何与国际各类体育文化进行比较与互动是催生其文化活力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形于中”而“发于外”^[37]。当前我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交锋、交融形势复杂,在这一过程中,他国对华认知的兴趣越来越高涨。红色体育文化更应趁此时机积极开展文化诠释,扭转他国关于其政治主导的刻板印象。进而以红色体育文化作为红色文化的具体抓手,让世界了解什么是客观、真实的红色文化。

其一,将红色体育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话语主题的同质创设。红色体育文化兼顾国内国际发展的重要特征为其纳入“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等国际话语提供了逻辑通路。对此,可以将红色体育文化中的人民主体、团结合作、因地制宜、基于国情进行形式创造等元素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结合。将之打造为非西方式体育现代化

道路的典型路径,推广至各发展中国家,为其在体育文化建设的早期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其二,将红色体育文化与国际主流体育文化进行对比研究并探寻互动路径。红色体育文化中以人民为中心、体育道德等要素与奥林匹克文化中的和平理想、参与比取胜更重要等要素具有高度的互通性。我国可以在各类主场体育对外交往中以红色体育文化为典型案例进行文化联结,让他国了解红色体育文化的历史与实践方式。除此之外,还可以将红色体育文化作为母本纳入“一带一路”“上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体育文化建设中,开发出与各多边平台相适应的体育项目。

其三,培养一批红色体育文化话语诠释者进入各区域、各维度的国际组织进行文化分享。讲好中国故事的落脚点呼唤红色体育文化提供话语主题,因此可以培养一批立足我国立场、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青年前往世界各地讲述红色体育文化。虽然孔子学院发展受到一定阻滞,但是具有国际胜任力的青年还可以进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奥委会等具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中进行任职,在其过程中围绕红色体育文化进行各类活动的设计或者自创国际自媒体进行相关内容的分享。久而久之便能够逐渐积聚起红色体育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5 结语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38]与此同时,“理论自觉、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力量”^[39]。对此,我们需要守正创新红色体育文化,将之与新时代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建设深入结合,做到“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38]。根据习近平在文化发展传承座谈会上对文化工作的最新部署,加强红色体育文化学理研究,使红色体育文化融入时代特色,擘画红色体育文化传承发展路径,体现了体育人关切国家发展大局、怀揣历史记忆、面朝未来发展的使命自觉。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17(2).
- [2] 党挺.中国红色体育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3.

- [3]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N].人民日报,2023-06-03(1).
- [4] 尤传豹,高亮.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J].体育学研究,2023,37(2):1.
- [5] 党挺,虞重干.近60年我国红色体育研究评析[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0,34(4):21-24,33.
- [6] 王增明,党挺,李颖,等.中国红色体育的发展进程与历史经验[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21,38(3):257-262.
- [7] 刘显,熊晓正.红色体育文化思想的历史与发展[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2,35(2):29-34.
- [8] 杨芳,杨茜.中国红色体育发展历程、特点与新时代启示[J].2022(9):29-35.
- [9] 毕金泽,郭振,刘波.中国共产党的“红色体育”实践及其历史意义[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21,33(2):133-139.
- [10] 刘润为.红色文化与中国梦[N].人民日报,2013-11-14(7).
- [11] 青年实话.本报发起赤色体育组织[J].青年实话,1933,2(11):28.
- [12] 罗时铭.中国体育简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6.
- [13] 魏挺群(阿伪).赤色体育运动与青年[J].青年实话,1933,3(4):33.
- [14] 佚名.现在要说到苏维埃的文化教育了[N].红色中华,1934-01-26(3).
-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6] 曾颢.中央苏区体育史[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
- [17] 福建省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闽西苏区体育[G].1986.
- [18] 王增明.陕甘宁边区体育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 [19] 林恺.回忆苏区体育运动活动片段[J].新体育,1960,19.
- [20] 马海德.忆延安时期体育生活[J].新体育,1980(8):2-3.
- [21] 曾颢.苏区体育资料选编(1929-1934)[M].安徽:安徽体育史志编辑室,1985.
- [22] 谷世权.中国体育史[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3.
-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4] 荣高棠.当代中国体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 [25] 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体育运动文件选编(1949—1981)[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
- [26] 崔乐泉.中国共产党体育实践的百年历程与经验启示[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21,33(2):117-126.
- [27] 李强.红色文化的本质、特征及传播路径[J].社会科学家,2020(7):153-157.
- [28] 何洪兵.价值遮蔽与彰显:红色文化的当代传承[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161-168,199.
- [29] 杨海霞.红色文化的内化困境及对策探析[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0,36(4):129-133.
- [30] 中华文化学院.中华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
- [31] 布特,肖文升.文化自信与建设体育强国的文化基因考

- 量[J]. 体育学研究, 2019, 2(1): 50-59.
- [32] 习近平. 贯彻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扎实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N]. 人民日报, 2014-12-16(1).
- [33] 陈肖鹏, 张晓义. 共情传播视角下中华体育文化感召力提升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23, 42(3): 137-144.
- [34] 戴国斌, 曹可强, 郑国华, 等.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文化逻辑[J]. 体育学研究, 2023, 37(1): 15-21.
- [35] 付志铭, 黄莉. 文以载道: 我国体育口号的文化意涵与价值实现[J]. 体育学研究, 2023, 37(3): 117-126.
- [36] 郑杭生. 社会学概论新修[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 [37]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 [38] 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室, 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 [39]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 作者贡献声明:**
- 于思远: 选题, 撰写与修改论文; 顾帅: 收集资料, 修改论文; 毕金泽: 设计研究思路与指导; 郭振: 审阅指导, 提出修改意见; 刘波: 审阅指导, 提出修改意见。

Heritage and Rejuvenation: Categorization, Developmental Evolution,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of Red Sports Culture

YU Siyuan¹, GU Shuai², BI Jinze¹, GUO Zhen¹, LIU Bo¹

(1.Division of Sport Science & Physical Edu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2.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 Health,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Red sports culture is the precious spiritual wealth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inheritance of red sports culture reflects the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power and sports power. The research points out that the research scope of red sports culture should go beyond the historical interval of the New-Democratic revolution period and cover the whole development course of the Party. On this basis, the concept of red sports culture is put forward: Whe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ed the Chinese nation to carry out the New-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 sports industry came through the revolutionary, mass-based, scientific, and educational reform under the guidance of Chinese Marxism, and constantly creatively transforme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ports culture and modern sports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construc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 sports culture as a red culture. It further points out the four difficulties of the inheritance of contemporary red sports culture: the historical scene of the theme of red sports culture inheritance is lagging behind. The policy content of red sports culture inheritance planning is not perfect enough. The youth orientation of red sports culture inheritance is not clear enough. The global vision of red sports cultural inheritance is limited. At last, the research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solutions: first, renew the discourse of inheritance, constructing the symbol system of red sports culture based on history and present concern; Second, improve the inheritance policy, designing targeted policy content of red sports culture; Third, innovate the way of inheritance, creating a full range of red sports culture practice activities with young people in the new era as the core object; Fourth, extend the vision of inheritance, exploring and building a multi-dimensional path for the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red sports culture and global sports culture.

Key word: red sports culture; new-democratic revolution; new era;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rejuvenation